

# 女性公共领域与跨国空间正义的建构

## ——弗雷泽女性主义公共领域理论探析

戴雪红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弗雷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关注女性主义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问题的研究,经由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和“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批判,弗雷泽重构了“女性公共领域”和“跨国公共领域”等概念,描绘了一幅多元交叉的女性公共空间与女性主义联盟的美好图景。在对跨国空间正义实践的研究中,弗雷泽还引用了“世界社会论坛”这一实例,试图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对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和社会正义理论的挑战。不过,弗雷泽的这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遭到了一些政治理论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在弗雷泽的跨国公共领域理论与世界社会论坛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并对弗雷泽的全球民主和社会正义理论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批判民主理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思。

**关键词:**弗雷泽;哈贝马斯;女性主义;公共领域;跨国空间正义;世界社会论坛

**中图分类号:**B 089.1;D 66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6-0078-07

### 一、引论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词是德文 Offentlichkeit 的英译,法译则为 espace public,若再转译为英文则是 public space,即公共空间。国内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其译为“公共空间”<sup>[1]</sup>,主要是因为德文 Offentlichkeit 的原意有“公共性”(publicness)和“开放性”(openness)的含义。众所周知,对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概念的建构最知名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经典构想。实际上,哈贝马斯常常利用具体空间的隐喻——如咖啡馆、沙龙、俱乐部和公共广场等——公共领域最初就诞生于此,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男性成员以及知识分子相聚在一起,在这个社会空间中开展坦率的讨论。公共领域并不一定是指物理空间,而是指一个提供

民主公开辩论和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和话语空间,讨论的目标是达成共识。可以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公共空间理论的经典起源。

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性的阶段,他所描述的是公共领域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展现。但是他的概念被大大地发展了,许多学者已经抛弃了他的经验主义的断言。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了空间生产的理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表明公共领域是真实空间和生活中的公共空间的一种想像的空间和一种空间的再现。在列斐伏尔的“空间性—历史性—社会学”的三元辩证法的基础上,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提出一个全新的“第三空间”概念,并强调发展第三空间思想方法的,是后现代空间女性主义者的积极参与<sup>[2]</sup>(P17)。索雅指出,尽管有些空间女性主义

收稿日期:2016-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弗雷泽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逻辑谱系及其现实启示研究”(15BZX017)

作者简介:戴雪红,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副教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研究。

批判“并不那么具有空间意味”,但是仍然呈现出“一种更进一步的第三空间视野的努力”<sup>[1](P152)</sup>。

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西方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当代公共领域正通过诸如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出现而得以重塑,他们帮助开创了更加自治的公共空间,为空间批判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空间女性主义”以女性主义批判为传统,将空间和性别问题结合起来,探讨性别、权力与社会关系如何被反映和被塑造于空间化的秩序之中。其中,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将公共空间想象成由差异组成的、内在不稳定的和流动的区域,为女性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实际上,弗雷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关注女性主义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问题的研究,重构了“女性公共领域”、“另类的公共领域”和“跨国公共领域”等理论,对多元交叉的女性公共空间进行了描绘,并实现了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

## 二、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

在一篇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公共领域反思:一项对现存民主批判的贡献”中,弗雷泽首先承认,“类似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一些概念,对批判社会理论和民主政治实践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哈贝马斯的公式里,公共空间无非就是现实生活的公共面目,它是“话语产生和循环的场所,它在原则上能够批判国家”<sup>[1](P74)</sup>。但弗雷泽也进一步指出,哈贝马斯的思想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弗雷泽总结了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四个假设,并认为“这些假设是一个特定概念,即资产阶级的、大男子主义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sup>[1](P81)</sup>。弗雷泽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哈贝马斯的四个假设进行了修正与反驳。

哈贝马斯的第一个假设是:“假设公共领域中的对话者可能排除地位差异,‘仿佛’他们是社会平等者一样进行商谈。因此,假设社会平等不是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sup>[1](P81)</sup>。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将每人原先既有的不平等地位搁置(bracketed)不论,但进入公共领域后个人的互动模式、沟通话语的风格仍是社会不平等的展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互动,既受到本身相互联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风格的束缚,也受到地位不平等的支配”<sup>[1](P83)</sup>。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参与模式强调“任何人都可以接近”,弗雷泽则根据研究指出,哈贝马斯想象的“资产阶级

的公共领域”在历史上仍然排除了某些阶级、某些种族的人、以及女人。在公共领域的平等进入方面,女性因其性别从属地位、在话语商谈中的弱势处境,以及文化上的边缘化等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不能参加到公共领域中。“从属群体有时不能找到合适的代言人或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想法;而当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们发现没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遭到压制,被鼓励保留其不成熟的想法;而当他们说‘不’的时候,别人听到的却是‘是’”<sup>[1]</sup>。而男性却用“我们”来代替所有人。另外,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媒体等传播媒介以文化中立的姿态掩盖了女性等弱势群体的表达诉求而使其边缘化,没有经济、文化等的实质平等,女性并不可能实现平等参与。那么,公共领域只是公民实现自我管理的男性统治的舞台,女性只能徘徊于边缘或被排除在幕后。弗雷泽指出,公民应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必忽视社会不平等;达到平等参与的先决条件是消除社会不平等。

哈贝马斯的第二个假设是:“假设各种竞争性公共领域的激增必然远离而非通向更大的民主,因此单一的、综合性的公共领域总是优越于多元公共领域的结合”<sup>[1](P81)</sup>。我们知道,哈贝马斯对19世纪的公共领域非常赞赏,但却没有注意到当时发生的种种排斥现象,例如咖啡馆的常客主要是受过教育的富有男子。工人阶级、女性和少数民族基本上都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手段被排斥在外,不能参与到活动中来。因此,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描绘的往往是单一的、一致的公共领域。然而,在复杂而分化的社会中,我们应该考虑到多元公共领域的存在;它们各自围绕的核心,是由不同种族、性别、性倾向和宗教信仰所界定的社会群体。弗雷泽说:“我主张,在阶层化社会中,那些能够接纳多元竞争性公共领域进行论辩的安排,比单一性、综合性、包罗万象的公共领域更能促进参与平等理想的实现”<sup>[1](P86)</sup>。

哈贝马斯的第三个假设是:“假设公共领域中的话语应该被限制在关于共同利益的商谈方面,因此‘私人利益’和‘私人议题’的出现总是不必要的”<sup>[1](P82)</sup>。弗雷泽对这个强调只能讨论公共事务的第三个假设进行了反驳。首先,是公共事务的界定问题。弗雷泽认为,并不存在先在的“公共性”,它是在商谈过程中产生的,“相反,它意识到偏好、利益和认同既是公共商谈的前因也是其后果,是在商谈过程中且通过商谈被话语性建构的”<sup>[1](P93)</sup>。如果女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或在商谈中处于少数,那么女性的问题如家庭暴力就不能上升为公共议题而难以解

决。其次,弗雷泽批评了“家庭隐私”的观念,因为它通过对某些议题的私人化或者家庭化把它们排除在公众协商之外:“与公共的政治事务不同,它是将其作为隐私的家庭事务或个人的家庭事务。”弗雷泽还向“经济隐私”的观念提出挑战,因为它通过对议题进行简化把一些议题排除在公众协商之外:“在此所讨论的议题是被作为非个人的市场要素,或是作为私有制的特权,或是作为经理人或计划者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都与公共的政治事务相对”<sup>[9](P94)</sup>。

哈贝马斯的第四个假设是:“假设一个运行中的民主改革领域需要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彻底分离”<sup>[9](P82)</sup>。弗雷泽指出,国家与社会是分离的,但不是彻底分开的。弗雷泽提出了强公共(代表民意的国会)与弱公共(舆论),主张需要反思强/弱公共与民意间的关系,将其理论化,探讨更新公共领域的可能性。一方面若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有限政府下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话,禁止公共领域讨论经济问题反而与其自由精神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若把“市场经济”看作非政府组织,它与国家的彻底分离往往会削弱它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对政府的影响,也就是一种弗雷泽说的弱公共领域,弗雷泽认为还应该考虑强公共领域,“而且,主权议会是我所谓的强公共领域,即其话语既包括舆论形成也包括决策的公共领域”<sup>[9](P96)</sup>。这对女性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作为一种情况,若政府任由市场发展而不予干预,处于弱势经济地位的女性的处境将难以改善;在后一种情况下,女性公共领域既是存在也一般处于下层反公共领域上,它们如何影响到政治决策从而有效发挥女性公共领域的作用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之,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四个前提假设进行了驳斥,从而揭露了其公共领域本身就是排斥女性的。随后,弗雷泽改编了公共领域的模式,以便考虑到多重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 三、女性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构建

#### (一)建立“下层的反公共领域”

弗雷泽批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虚假公平性排斥了女性,“相反,它是男性资本家阶层的竞技场、训练场及其最终的权力基础,而这一阶层逐渐将其自身视为‘普遍性阶级’,准备宣称自己是最为合适的统治者”<sup>[9](P78)</sup>。弗雷泽认为,导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的还由于他没有考虑其他非资产阶级的竞争性反公共领域,如“下层的反公共领

域”(subaltern counterpublics),即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等社会的边缘群体建构的以对自己的身份、利益和需要提出反对声音的领域。“下层的反公共领域”的内容包括集结个别女性参与的话语、重塑女性需要与认同、以及创造新词汇来指涉那些原本在公共领域中说不出、也无法说出的现象,这样的论点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一段差距,但是却为女人创造更积极参与对话的能力和空间。弗雷泽认为“下层的反公共领域”的讨论氛围,是去中心、没有权威,同时公/私界限不清的,这不一定对统治阶级形成对抗,反而对更大的主流文化价值提出反省与改造。去权威、由个人经验分享出的话语方式,鼓励原本在公共领域中不能或很少被讨论的议题重新浮上台面,也让平常较少发言,不善于话语的女性观众,有了说话的机会。

弗雷泽充分肯定了“下层的反公共领域”及其作用:“由于这些反公共领域的兴起是作为对于被排斥在统治性公共领域之外的回应,因而它们有助于扩大话语空间”这是对原先公/私领域界限的挑战,从而让更多的下等社会阶层能够参与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中。以美国20世纪妇女运动为例,弗雷泽论证了女性的“下层的反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或许最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后半期美国女性主义的下层反公共领域,它拥有丰富多样的杂志、书店、出版公司、电影和电视传播网、系列讲座、研究中心、学术计划、讨论会、年会、节日和地方见面会”<sup>[9](P87)</sup>。在这个公共领域中,女性们还创造了大量自己的话语,如“性别歧视”、“性骚扰”等,并重新表达她们在男性公共领域中被忽视的诉求。

#### (二)构建多元交叉的女性公共空间

弗雷泽指出,公共领域不应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空间,我们必须重新思索我们的公共空间概念,视其为多元分化的公共领域,有些群体可以使用它,其他群体则被排除在外。“下层的反公共领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具有退出或重组空间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是通向更大公共领域的煽动性行为的基地和训练场所。这两种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恰恰是其解放潜力之所在”<sup>[9](P88)</sup>。弗雷泽指出,要实现哈贝马斯所指出公共领域具有的开放性理想,并且避免过去传统民主制度造成之排除,就应该让公共领域中存在“下层的反公共领域”。这些次公共代表着现阶段中未成为主导意见的一股话语力量,他们不仅可以作为重组群体的空间,也可以作为进一步公共活动的

训练基础。

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的讨论忽略弱势社群在公共领域中的弱势地位,这些多元的差异,势必会在公共领域中被抹消、排除,因此她认为弱势社群必须先创立一个对她们自己有利的话语空间,放在福柯的话语脉络(context),即先建立异质空间。在一个多元差异化而又要求民主和平等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应是多元而非单一的。由此,鉴于女性之间的地域、阶级、种族、民族、性取向等差别,多元女性公共空间成为必然,并且不同的女性公共空间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和合作,这样更能促进不同女性通过公共领域进行辩论协商,表达诉求,实现女性的共同发展和解放。“公共领域的无界限特征及其开放性取向,允许人们不止参与一个公共领域,因此不同公共领域的成员可能部分重叠。这反过来又使得各种文化之间的交往在原则上成为可能”<sup>[9]</sup>(P90)。

最后,弗雷泽概括了她的观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并不足以批判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民主的局限。……首先,我揭示了一个恰当的公共领域概念不只需要排除而是消灭社会不平等。其次,我证明了无论是在阶层化社会中还是平等主义社会中,多元公共领域优于单一公共领域。再次,我说明,一个合理的公共领域概念必须支持的,不是排除而是要将资产阶级男权主义意识形态贴上‘私人’标签且视为不能容许的利益和议题纳入其中。最后,我指出,一个站得住脚的概念必须既考虑强公共领域也考虑弱公共领域,同时它也应该有助于两者关系的理论化”<sup>[10]</sup>(P98)。总之,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层级化社会中,弗雷泽捍卫的是“下层的反公共领域”;在平等主义社会中,她捍卫的是多元交叉的女性公共空间。接下来,弗雷泽还把女性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推广到跨国的全球范围内。

#### 四、跨国空间正义的性别之维

##### (一)对“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批判

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两本书中都假定了公共领域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公共领域均被概念化为与一个有边界的政治共同体以及一个主权领土国家同时并存”<sup>[11]</sup>(P93),弗雷泽对此进行了挑战和批判。第一,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及其公众舆论置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的边界领土范围内,然而,全球问题及话语的流动和传播使得这一点与事实经验相悖。

弗雷泽指出:“在今天,公共领域理论的威斯特伐利亚盲点是难以疏漏的。无论问题是全球变暖,还是移民、妇女权力,或者贸易条款、失业、反恐战争,公共舆论的当前动员很少停留在领土国家的边界上”<sup>[12]</sup>(P99)。第二,哈贝马斯默认参与公共领域讨论的成员是国家的全体公民。弗雷泽认为,它实际上只是授权给那些社会精英参与讨论的资格,而对于一般民众,特别是移民、散居国外者以及多重国籍的人却并没用相同的发言权。即使是具有一国平等公民权的女性,也往往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第三,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讨论的主题是国家经济,而弗雷泽只要稍稍提到跨国公司和海外商业注册、全球电子金融市场及保护世界贸易的各种组织和机构,就可以很容易地驳倒这一点。事实上,女性遭到的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剥削就应该纳入公共领域的讨论的议题。最后,弗雷泽还对另外三个假设进行了批判,即把国家媒体、国家语言、国家文化当作公共领域的基础,由此忽视了它们的多元性、流动性和共享性,因而与事实是不符的,也在某种程度上排斥了女性发挥能动性、以及打破公共领域框架对女性限制的可能性。

总之,在弗雷泽看来,除了福利国家政治力量的扩散和消费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外,多元化理论和大众民主的兴起,以及女性作为一股崛起的重要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哈贝马斯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公共领域及其“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因此,从跨国范围中思考公共领域的边界,不仅是可能的还是必要的。

那么,弗雷泽的术语“跨国公共领域”的含义是什么呢?她对这个术语的分析采用两个层面:“一个是经验与历史的层面,另一个是意识形态——批判与规范化的层面”<sup>[13]</sup>(P93)。在最基本的经验层面上,弗雷泽遵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它在现代社会中指定了一个剧场,其中政治参与通过谈话这一媒介得以实现。它是公民协商其共同事务的空间,从而成为话语互动的制度性舞台”<sup>[14]</sup>(P74)。更为重要的,这个公共领域是“被视为公众舆论交往形成的空间。……被认为是将公众舆论配置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工具”<sup>[15]</sup>(P90)。然后,弗雷泽又扩展了这一模式,考虑到公共领域的“跨国”的性质,力图阐明诸如“‘散居海外者公共领域’、‘伊斯兰公共领域’以及兴起中的‘全球公共领域’等。”“跨国公共领域”可以被理解为——话语的舞台和交流的运行“溢出民族与国家边界”<sup>[16]</sup>(P90)。总之,“跨国公共领域”这个观念“对于那些目的在于在当前的‘后国家群体’中重建批判理

论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sup>[5](P91)</sup>。另外,创建一个活跃的、扩展的、包容的跨国公共领域也是摆脱西方民主困境的一个出路和关键<sup>[6]</sup>。

## (二) 女性主义联盟的构想与跨国空间正义追寻

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从《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到《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以及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参与公共领域讨论的人,都存在着将公共领域的边界设定在领土国家范围之内的盲点,而这与经济组织、公众舆论等的跨国流动不相符。女性在跨区域斗争中对公共领域的期待也不应停留在“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内,这使得女性跨国主义联盟成为可能和必要。一方面,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女性所面临的跨国剥削和家庭暴力,以及女性对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的共同关注,使得女性必须联合起来应对共同的遭遇;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斗争的扩大化也为不同领域的女性联合趋势创造了可能,正如弗雷泽所说:“通过将那些变化定位于战后资本主义与后共产主义地缘政治的变化序列之中,我的目标是推动有关我们怎样才能为了全球化世界而彻底改造女性主义方案的讨论。”通过回顾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弗雷泽指出:“我们已从一个包容性的运动(是由白人、中产阶级、同性恋的妇女们所主宰的),走向了一个更广泛的、更具包容性的运动(更多地关注同性恋妇女、有色妇女、贫困妇女和工人阶级妇女)”<sup>[5](P119)</sup>。不仅如此,弗雷泽还看到,女性主义者正利用跨国政策来彻底改造女性主义。“面对全球变暖、艾滋病传播、国际恐怖主义和超级强权单边主义,这个阶段的女性主义者相信,妇女过上好日子的机会,依赖于侵入领土国家边界的过程,就像依赖于被包括在领土国家的那些过程一样”<sup>[5](P131)</sup>。所以,女性们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平等、赋权及合作方式,以更好地参与社会改造与发展。

实际上,女性斗争领域的跨国化及其联合,也是社会发展趋势和女性主义发展状况使然,“当今关于跨国公共领域与世界民主的观念显然是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复杂、互相关联但同时又多样化与阶层化的世界的反应”<sup>[7](P81)</sup>。通过跨区域的联合,“很多参与到一个跨国的或者全球规模的集体行动中去的人,把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权利、公民平等以及反性别、宗教、种族、族裔或阶级歧视保护看成是优于国家统治的事情”<sup>[7](P82)</sup>。跨国女性联盟对女性解放运动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总之,弗雷泽批判了古典公共领域以来,尤其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排除女性,并根据女性主义斗争的发展趋势,构想了她的女性主义公共领域的愿景,即从下层女性反公共领域发展到多元交叉的女性公共空间,再到跨国公共领域和女性主义联合,不断扩大女性斗争的范围;从把女性个人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再到关注多元差异的女性以及跨区域的女性解放,弗雷泽的目标是实现全球性别正义和女性解放的宏伟蓝图,她所构建的空间女性主义批判理论是“更适合于旨在全球化世界中促进为社会正义而开展的民主斗争的批判理论”<sup>[8](P886)</sup>。

## 五、批评与反思:以“世界社会论坛”为例

在最近的一些文章如《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新建构正义》(2005)、《图绘女性主义构想:从再分配到承认到代表权》(2005)、《身份、排斥和批判:对四个批判的回应》(2007),以及《政治的框架:对南茜·弗雷泽的采访》(2007)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权利和性别正义:对话南茜·弗雷泽》(2008)等访谈中,弗雷泽都引用了“世界社会论坛”(简称WSF)这一案例,试图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对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和社会正义理论的挑战。弗雷泽把WSF描绘为一个新式的“跨国公共领域”,她指出:“在世界社会论坛上,一些具有解放意义政治的实践者们已经改革了跨国公共领域,在那里,他们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宣称与解决有关框架的讨论。利用这种方式,他们正在预测后威斯特伐利亚民主正义新制度的可能性”<sup>[9](P26)</sup>。除了弗雷泽以外,其他评论者也指出,在WSF中盛行的“开放空间”概念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之间具有相似性<sup>[9](P62)</sup>。那么,由弗雷泽发起的在WSF的实践与批判的民主理论之间的结合,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WSF是由巴西劳工党倡导举行,由全世界反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大型会议。它于2001年1月在巴西的阿莱格雷港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会议,其宗旨是把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的人们汇集到一起,为他们服务,给他们提供一个会晤的公共空间。在表决通过《原则宪章》的基础上,WSF提出了一些实现正义、团结和民主参与这些价值的具体建议,展望了为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可能替代方式,并力图建构一个全球公共民主空间。

一般说来,WSF被认为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尊重多样性的包容氛围。二是组织“开放空间”。WSF自称其政治文化是一个“开放空间”——“其作者之一将其比做‘广场’——被认为是无结构、无中介或无控制、无中心、无边缘、无排外倾向的一个无差别的空间”<sup>[10]</sup>。三是会议的非协商性。总之,WSF表明了公共领域正在日益超越国界,它被视为一个空间,一个过程和一个框架。

加拿大政治理论学者珍妮特·康韦(Janet Conway)和杰克特·辛格(Jakeet Singh)考察了弗雷泽的描述性与规范性方面的理论框架,并探讨了它对WSF的影响。首先,在他们看来,WSF和弗雷泽的“跨国公共领域”这一基本的实证概念——作为一个涉及交往联系和跨国界流动的,非暴力的、多元的、对话的空间——具有某些相似之处。WSF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在弗雷泽意义上的,与更全面的跨国公共领域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跨国的从属的反公共领域”,在这个跨国的话语舞台中,从属群体可以创造和传播反霸权的话语和身份<sup>[9]</sup>(P71)。其次,他们认为,虽然这一理论可能阐明一些WSF的特点,但WSF的许多最具挑战性和创新性方面被弗雷泽的框架所模糊和限制了。更为重要的是,WSF的实践对弗雷泽有关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批判理论也提出了许多严峻的挑战。第一,WSF是一个交流的空间,而不是协商的空间;第二,只能将WSF视为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弱意义上的跨国公共领域,而不是强意义上的跨国公共领域;第三,WSF的参与者都不是为了对付一个单一主权,也不打算寻求创造新的主权;第四,反新自由主义的定位赋予了WSF鲜明的政治色彩,超越了可以归因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的公共领域概念<sup>[9]</sup>(P71-73)。

简言之,康韦和辛格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弗雷泽将WSF加入她的公共领域理论,而是认为在弗雷泽的跨国公共领域理论与WSF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并对弗雷泽的全球民主和社会正义理论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批判民主理论进行了质疑和反思。

总之,弗雷泽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家,对造成女性不利处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描绘了多元交叉的女性公共空间、跨国公共领域和跨国空间正义的美好图景,但是她的阐释被批评为过于理想化而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即使面对WSF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弗雷泽仍然渴望为其提供一个普遍

的理论,即“批判观必须捍卫全面性、综合性、规范性、纲领性思想的可能性和可期性”<sup>[9]</sup>(P4)。与此同时,她还主张“在所有的文化复杂性之下存在着一个单一的道德规则:参与平等的原则”<sup>[11]</sup>。因而,正如加拿大哲学家尼古拉斯·孔普雷迪斯(Nikolas Kompridis)在对弗雷泽的批评中所指出的:“为什么这种强有力的正义概念可能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价值多元主义和高度多样性挑战的一个部分呢”<sup>[12]</sup>?总之,弗雷泽根据全球化背景下女性面临的新问题提出全球女性主义联盟的倡议缺乏现实路径,在不同地域、种族和民族差异分明的情况下,如何打破它们所造成的界限而让不同种族、国别和性取向等的女性联合起来,确实不是单纯提出这一理论就能解决的。

#### 参考文献:

- [1] (法)雷米·里埃菲尔.传媒是什么[M].刘昶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序言.4.
- [2] (美)Edward W. 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3]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于海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4] Jane Mansbridge, Feminism and Democracy[J].The American Prospect, 1990, vol.1:127.
- [5] (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欧阳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6] (美)南希·弗雷泽.西方民主的危机与对策:公共领域的跨国化[J].邢立军译.社会科学战线,2015,(4).
- [7] (斯洛文尼亚)斯拉夫科·斯普里查.全球治理与公共领域的跨国化[J].石力月译.新闻大学,2012,(5).
- [8] Nancy Fraser, Marek Hrubec, Towards Global Justice: An Interview with Nancy Fraser [J].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 Vol.40, No.6.
- [9] Janet Conway, Jakeet Singh, Is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 Nancy Fraser,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ontainment of Radical Possibility [J].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09, Vol. 26(5).
- [10] (法)克劳埃·凯拉海尔,(印)杰伊·森.开放空间的探索:世界社会论坛与政治文化[J].李存山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05,(4):19.
- [11] (美)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M].周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167.
- [12] (美)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高静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93.

【责任编辑:张西山】

# Public Sphere for Females and Justice Construction in Transnational Space: on Fraser's Feminist Public Sphere Theory

DAI Xue-hong

(College of Marxism at Nanjing University, Advanced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Since 1980s, Fraser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public sphere and public space for females.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Habermas's public sphere theory and "Westphalia" framework, Fraser reconstructed the concepts such as "female public sphere" and "transnational space" and pictured a beautiful multi-dimensional prospect of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female public sphere and feminism. In her research on justice practice in transnational space, referring to the instance of the World Social Forum, Fraser tri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to Westphalia's concept of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However, the combination of Fraser's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met with criticism from some political theorists. They believe Fraser's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 is not coordinated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World Social Forum. They also criticize Fraser's theory of global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and more general criticism of democracy.

**Key words:** Fraser; Habermas; feminism; public sphere; justice in transnational space; the World Social Forum

---

【上接第 52 页】

# Maker Movement and the Strategies for Shenzhen to Build a Maker City

WEN Wen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Maker campaig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ity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pioneers in maker campaign, Shenzhen was the first to set the goal of building itself as a "maker city". At present, Shenzhen boasts of maker spaces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 systematic maker education at early stage and rich related activities, and also offers support for various maker policie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s maker culture is confronted with many problems such 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ing small in number, maker service being not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 maker culture being not popular, and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fast-rising makers of other c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maker campaign, Shenzhen can seek effective ways to build itself a maker city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taking the lead in open-source innovation, establishing shared platforms, creating bay area ecology, and making itself connected to the world.

**Key words:** maker; a maker city; open-source innovation; the ecology of the bay area